

民国时期的大学新闻教育办学模式比较研究

——以1930—1940年代燕京、复旦、政校新闻系为例

王继先*

[摘要] 1930—1940年代,以燕京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央政治学校新闻教育为代表的中国大学新闻教育在模仿西方尤其是密苏里新闻教育办学模式的基础上,通过不断实践创造出了符合各校自身发展实际,因应时代、社会和国家要求的不同办学模式。本文以这一时期上述三所大学新闻系为例,通过比较研究不同模式的办学宗旨与目标、课程设置、教师选择、培养成果,揭示民国时期大学新闻教育不同办学模式带给我们的共同启示。

[关键词] 民国时期;大学新闻教育;办学模式;比较研究

在民国时期特殊的社会环境下,中国大学新闻教育发展到20世纪30—40年代,形成了外国教会大学、官办公立大学和民间私立大学“三分天下”的基本格局,并以各具特色的办学模式在当时中国大学新闻教育领域分别占据一席之地。

一、早期中国大学新闻教育的起源

“民国初年开始出现职业记者,……随着后继者的增加,职业记者作为一个群体得到关注。”^①与此同时,作为中国早期新闻从业者主体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本身也经历着由传统儒家文人转型为现代知识分子和职业化、专业化报人的重要过程。

(一) 中国大学新闻教育在民国时期的发端

尽管“许多中国报人试图为其自身建立职业化模式时,实际上所构建的只是一种类似观念的东西”,^②但当中国近代新闻事业力争以一种专业新闻纸而非论政工具的面目出现时,办报的实际责任就不是纯粹的传统文人以及“类似观念的东西”所能胜任,而只能由职业报人通过专业新闻实践承担了。

*新闻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民国新闻史研究所副研究员,210097。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13&ZD154)阶段性成果。

①罗映纯、林如鹏:《公共交往与民国职业报人群体的形成》,《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年第5期。

②[澳]特里·纳里莫、李斯颐:《中国新闻业的职业化历程——观念转换与商业化过程》,《新闻研究资料》1992年第3期。

然而就在此时,中国新闻事业却面临专业人才匮乏的现实问题,因此尽快举办中国大学新闻教育,培养造就以新闻为职业的高素质专业化本土新闻人才成为民国早期中国新闻界的共识与当务之急。

1908年建立的密苏里新闻学院作为全球第一所独立新闻学院,提出了“较为明确、系统的新闻教育及新闻人才培养的理念,并探索建立了此后对世界新闻教育有普遍性影响的新闻教育模式”。^①1914—1928年,其创始人威廉(Walter William)五次来华,有意识地将密苏里新闻教育模式推入中国。“鉴于当时中国报业道德低,水准差,缺乏社会责任,知识界和报界普遍不满,他们认为密苏里这套理念对症下药,切中中国的时弊。在操作上,密苏里不唱高调,格外注重动手做,实际又易学,移植起来不难。”^②这恰好为刚刚起步的中国大学新闻教育及时提供了一个可以模仿的“范式”^③,使其从一开始就具备了与世界先进大学新闻教育接轨的可能。1917年,徐宝璜在北大为文科学生开设《新闻学》课程,这与1893年约翰逊(Joseph French Johnson)在宾夕法尼亚大学首次开设明确的新闻学课程相隔仅24年;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创立,此时距密苏里新闻学院成立仅10年。

(二) 中国大学新闻教育的早期发展

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创立是中国报业教育之发端。此后近十年间,中国大学新闻教育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据统计,1920—1926年,全国高校共创办了12个新闻系(科),初步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新闻传播教育系统。这其中主要有: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新闻系(中国最早的大学新闻系),南方大学、国民大学、沪江大学、大夏大学、光华大学报学系和复旦大学新闻学组;北京的平民大学报学系(国人最早自办的正规大学新闻教育),民国大学、国际大学和燕京大学新闻系;厦门的厦门大学报学科。此外,南京中央大学、广州中山大学、上海商学院也曾举办新闻科或新闻学课程。中国早期新闻函授教育机构,如上海新闻大学函授部和新闻专修函授学校等也开始出现。1928年后,中国新闻学院(广州)和民治新闻学院(上海)等新闻专科院校开始出现。1935年,国民党中央政校新闻系建立,开民国时期国立大学创办新闻系之先河。抗战期间,复旦、政校、燕京等校新闻系及民治新闻专等纷纷内迁;国民大学、社会教育学院等校新闻系及重庆新闻学院也在大后方建立。1938年前后,全国有一定影响的各类专科以上学校及独立研究机构所办新闻系科(专业)达到39所(个)。

中国共产党早期新闻教育始于1930年代初“青记”举办的左翼记者联盟训练班。1939年7月创办的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新闻系成为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前最早创办的新闻教育机构。至1948年,华中新专、华北联大新闻系、山东大学新闻训练班、延安大学新闻班、中原大学新闻班等先后在解放区建立。此外,各地(包括新华社)还举办了一批新闻干校(干训班)。新中国建立前夕,华东新闻学院和北京新闻学校分别在上海和北京举办。中国共产党新闻教育“是在中国新闻教育发展有一定阶段,在中国社会面临新的抉择的情况下出现的”,^④继承了中国新闻教育的优良传统,突出党性教育,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适用教育为主,为党的新闻事业培养了大量急需人才。然而,由于受到艰难的时代环境和客观条件限制,新中国建立以前中国共产党新闻教育尤其是大学新闻教育尚处于一种萌芽状态,普遍存在办学规模较小、时间较短等情况,尚未形成系统的大学新闻教育办学模式。

①林牧茵:《移植与流变——密苏里大学新闻教育模式在中国(1921—1952)》,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页。

②张咏、李金铨:《密苏里新闻教育模式在现代中国的移植——兼论帝国使命:美国实用主义与中国现代化》,引自李金铨主编《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00页。

③美国学者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认为,建立一个新的“范式”(paradigm)需要有三个要素:一是一组抽象思想;二是一套成功的例证;三是能够解决实际问题。

④文欣、吴廷俊:《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新闻教育》,《新闻出版交流》2003年第4期。

（三）以燕京、复旦和政校新闻教育为办学模式研究对象的选择

大学新闻教育办学模式是大学新闻教育在办学实践中形成的具有一定程式的行之有效的教育策略系统。这个系统模式的形成既受到大学办学性质、办学环境和时代社会需求的深刻影响,也有赖于大学新闻教育在办学实践中与时俱进的主动调整、自我优化、经验总结与特色彰显。以燕京、复旦和政校新闻教育作为民国时期大学新闻教育办学模式的主要研究对象有以下三个原因:

首先,民国时期较为成熟和系统的大学从性质上主要分为教会大学、私立大学和公立大学三种类型,民国大学新闻教育也基本由这三种类型的高等学校承担。1930—1940年代的燕京、复旦与政校在性质分属于教会大学、私立大学和公立大学,其新闻教育办学性质在当时具有代表性。

其次,燕京、复旦与政校新闻系的建立与发展基本处于同一时代、同一社会环境中,且三校新闻教育在此时此境下均处于发展上升期;在办学时间、规模和水平等方面,也是当时最为系统、最富有成效、最具特色的大学新闻教育机构。1936年,马星野指出:“目前报业教育,正式大学有新闻专系者,为燕京大学、复旦大学及本年才设立新闻系之中央政治学校。”^①同年,梁士纯也指出:“南北各大学设有新闻学系或新闻学科的不下二三十处。在这二三十所学校中,设有新闻学系者,现在仅有燕京、复旦和中央政治学校。”^②因此,以这一时期此三校新闻教育作为研究对象具有较高的可比性。

第三,随着办学的发展,燕京、复旦和政校新闻系的办学特色得到充分彰显。如果以“办报”来比喻办学,那么燕京新闻系办的就是一张“美国报”;复旦新闻系办的就是一张“地方报”;政校新闻系办的则是一张国民党体制内的“党报”。这种既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又富有鲜明个性特色的办学实践体现了民国时期中国大学新闻教育较为成熟的办学模式之间的差异性。

综上所述,燕京、复旦和政校新闻系依据自身的办学性质、办学环境和时代社会需求,通过各具特色的办学实践,系统地形成了民国时期中国大学新闻教育行之有效的“燕京模式”、“复旦模式”和“政校模式”,为深入开展比较研究提供了代表性、可比性和差异性。

二、民国时期大学新闻教育办学模式的多维比较

特定大学新闻教育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相对稳定且明显区别于“他者”的诸种要素之和构成了大学新闻教育模式。这些要素主要包括各校新闻教育的办学目标与宗旨、新闻专业的课程设置、新闻专业教师的选择、新闻人才的特色培养等。

（一）办学宗旨与目标：不同追求的差异化定位

燕京新闻系由美国人白瑞登(R. S. Britton)于1924年创办,“密苏里新闻学院始终是其背后最为重要的支撑力量”。^③1934年前,“燕大新闻学系之目的,是借着鼓励许多受过良好教育,有理想的人从事新闻工作,以协助中国发展出高尚、富有服务精神及负责任的新闻事业。……以期他们能把新闻事业建设成为最具潜力的事业,成为促进公益及国际友好关系的砥柱。”^④1934年梁士纯接掌该系后提出了培养新闻行业领袖人才的目标。他认为:“一个健全的新闻教育机关最高的目的,不仅要为报业来训练专门的技术的人才,而更要培养有眼光,有才干,有勇敢,有牺牲精神的领袖。”^⑤

①马星野:《新闻职业与大学教育》,《报展纪念刊》1936年。

②⑤梁士纯:《中国新闻教育之现在与将来》,《大公报》1936年5月9日。

③林牧茵:《移植与流变——密苏里大学新闻教育模式在中国(1921—1952)》,第131页。

④卢祺新、[美]葛鲁甫:《燕京新闻系》,引自燕大文史资料编委会:《燕大文史资料(第三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9页。

复旦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私立大学,向来提倡“开放精神”、“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①1929年,复旦新闻系创始人谢六逸提出新闻系的教育任务应是“为本国报馆培养经营人才,培养编辑人才,同时为普通学校培养新闻教育人才”。^②1942年陈望道接掌新闻系后倡导民主办学,提出“宣扬真理,改革社会”的办学指导原则,从而形成了复旦新闻系追求民主、自由的传统与风格。

政校新闻系1935年经国民党中央决议成立,马星野负责实际系务。作为国民党最高学府,政校的使命“在为党国培植政治干部,所以他办理的新闻教育,也不与一般大学的新闻系相同。这一点,校长蒋总裁曾有明白指示,总裁说:‘我们的宗旨,在于阐扬主义,宣传国策,来完成我们抗战建国的使命’,‘我们要抱定宗旨,始终贯彻,来改良中国的新闻事业,树立三民主义的文化基础’。这就是中央政治学校办理新闻教育的特殊使命,也就是中央政治学校新闻教育的特殊精神。”^③这个宗旨同时也是国民党“对新闻事业的指导总原则,及对新闻教育的总方针”。^④

(二) 课程设置:各有侧重的知识架构

燕京新闻教育是对密苏里新闻教育模式的“全方位的横向移植”。^⑤1929—1937年间,燕京新闻系“所有的新闻教科书或参考书没有一本是中文的”^⑥。1932年前后,该系基本课程分为“新闻学基础”(新闻学导言、比较新闻学、新闻学史);“新闻写作”(报章文字、特载文字、社论);“新闻实务”(通讯练习、新闻之采访与编辑、出版须知、报纸参考资料、报纸图画、广告原理、营业及印刷法)三类;1938年后,该系将必修课程、副修课程、语言课程的比重加以细化,重点对专修(专业)课程、语言文字课程等提出具体的学分和成绩要求。同时,1928年后该系成立了在教师指导下以学生为主体的新闻学会,出版英文《新中国月刊》(The New China)和中英文《平西报》作为学生理论研究和实习平台;试办“新闻学讨论周”,以联络新闻业界、学界先进;开展修业旅行活动,鼓励学生积极写作投稿。^⑦该系还明确要求学生必须在报业或其他新闻事业机构实习一年,方能获得新闻职业资格证书,这既为当时三所大学中所独有,也体现出美国“重实用”教育模式的鲜明色彩;侧重实践知识的课程安排和重视实习教学环节的培养使学生具有了“上手快”的特点。

复旦新闻系的课程设置颇具中国特色。早在1931年,谢六逸就应国民政府教育部邀请创制了《中国大学新闻系课程设置标准》;1935年,他对复旦新闻系课程结构作出五方面规划:一是基础知识,如中英文、自然与社会科学、体育、第二外语、心理学、伦理学、广告学、统计学、工场管理等;二是专门理论与实践知识,如新闻学概论、新闻编辑与采访、报馆组织与管理、新闻广告与发行、照片制版与印刷等;三是辅导知识,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法律、历史、地理、外交、国际常识等;四是写作技能,如速记术、校对术及评论文、通讯文、新闻记事写作等;五是实习与考察,包括在社会新闻机构与校内自办平台实习、赴国外考察等。^⑧同时要求该系学生“在一二年级时,……以攻读前面的‘基础知识’、‘辅导知识’为主,但亦得兼读选修课程(如新闻学概论)。第三年级学生,课程加重,专攻本系特设的各学科(即专门知识),并注重写作技能。至第四年级,课程听讲时间减少,以深入社会,实习考察为

①秋阳:《谢六逸与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创办》,《新闻大学》1997年第3期。

②谢六逸:《新闻教育的重要及其实施》,引自龙伟、任羽中、王晓安:《民国新闻教育史料选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5—26页。

③张学远:《中央政治学校的新闻教育》,《中国新闻学会年刊》1942年第1期。

④马星野:《蒋校长与政治大学》(手稿),《马星野档案》099-01-02-02-018,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

⑤林牧茵:《移植与流变——密苏里大学新闻教育模式在中国(1921—1952)》,第136页。

⑥卢祺新、[美]葛鲁甫:《燕京新闻系》,引自燕大文史资料编委会:《燕大文史资料(第三辑)》,第31页。

⑦黄昭先:《燕京大学新闻系概况》,引自龙伟、任羽中、王晓安:《民国新闻教育史料选辑》,第37—42页。

⑧复旦新闻系自办实习平台主要包括:印刷所(为学校与学生投资举办的股份公司性质);中英文复旦校刊;复兴通讯社(经正式注册登记成立,并有实际业务)等。

重”。^①复旦新闻系也十分重视专业教育与社会活动的结合,1935年该系举办了“世界报纸展览会”,在当时引起轰动。

政校新闻系课程是按照其特有的“四分法比例”设置。“新闻系的课程,60个学分之中,有32个属于一般社会科学类,有16个属于新闻学类,有12个属于语言文字类。”^②“这个四分法比例,以后十几年,都是继续不变。”^③该系同样十分重视学生的实习实践,出于“新闻记者不单应当是学问家,还应当是事业家”的构想,^④其在创建之初即成立了新闻学研究会,要求所有学生都成为会员;编辑校刊,并在重庆举行了世界报纸杂志展览会;先后创办了公开发行的《中外月刊》《芷江民报》《新闻学季刊》等,在当时新闻界和社会大众中均有一定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政校新闻系课程安排与燕京、复旦有四个明显不同:一是社会科学课程分量最重,占全部课程的一半以上;二是没有安排自然科学课程;三是引进了更多的政治课程,如国民党政策、民意和宣传等;^⑤四是增加了学生赴国民党中宣部等国民党体制内新闻指导和管理部门实习的内容,明显反映出了其在国民党体制内办学的性质和要求。

(三) 教师选择:各取所需的师资队伍

燕京新闻系的任课教师“不是美国人,就是接受了美国教育的”。^⑥这其中密苏里新闻学院的影响更加明显。比如美国教师中的白瑞登、聂士芬(Vernon Nash)、葛鲁甫(Samuel D. Groff)、马丁(Erank Martin)、谢文兰(Sara Lockwood Williams)、斯诺(Edgar Snow)以及中国教师中的梁士纯、黄昭宪、张继英、汤德臣、蒋荫恩等都有着深厚的密苏里背景,或曾是密苏里的教师,或是密苏里的毕业生,或有过留学密苏里的经历。此外,该系还邀请了一大批校内外各界知名学者、资深报人及各国驻华新闻机构知名记者来校讲学,^⑦其中就有曾经留学密苏里的政校新闻系主任马星野。

作为本土私立大学的复旦新闻系在师资选择上取“兼容并包”方针,不很在意教师的中外之别与思想倾向不同,而更加注重专业背景和研究实践能力。因此该系外国教师不多,中国教师中既有国民党体制内的程沧波(曾任系主任)、刘光炎、陶希圣、胡健中等,也有与国民党政治意向不同的陈望道(曾任系主任)、张志让、陆诒等,更多的则是如戈公振、郭步陶、黄天鹏、储安平、赵敏恒、舒宗侨等当时新闻业、学两界名人。这些专业成绩斐然而政治理想各不相同的教师对复旦新闻系多样性办学特点的形成起到了显著的效果;大量有民主进步思想的教师主持或参与办学,对复旦新闻教育的思想倾向更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政校新闻系对老师人选的物色非常重视,聘请刘觉民、黄天鹏、汤德臣、沈颂芳、钱华、谢然之、俞颂华、王人麟、赵敏恒、顾执中、王芸生、戴公亮等讲授专业课;聘请左舜生、陈石孚、崔书琴、寿勉成、赵兰坪、萧孝嵘、孙本文、胡贯一、詹文浒、方东美等讲授社会科学课;聘请戴德华(Edward G. Taylor)、怀娣(Roberta White)、周其勋等讲授语言文字课;邀请陶希圣、董显光、曾虚白、潘公展、刘光炎、萧同兹、许孝炎、陈博生、王芑生等众多国民党高官与体制内新闻人和储安平、戈宝权、彭乐善、甘乃光等富有写作、编辑、采访经验的名记者、国际问题专家和其他专家学者来系讲授专业课或做专题报告、学

①谢六逸:《复旦大学新闻学系概况》,引自龙伟、任羽中、王晓安:《民国新闻教育史料选辑》,第113—119页。

②马星野:《新闻记者之训练问题》,《新民族》1938年第19期。

③马星野:《政大新闻教育之创始与发展》(手稿),《马星野档案》099-01-02-02-050。

④张学远:《中央政治学校的新闻教育》,《中国新闻学会年刊》1942年第1期。

⑤张咏、李金铨:《密苏里新闻教育模式在现代中国的移植——兼论帝国使命:美国实用主义与中国现代化》,引自李金铨主编《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第304—305页。

⑥卢祺新、[美]葛鲁甫:《燕京新闻系》,载燕大文史资料编委会编:《燕大文史资料(第三辑)》,第31页。

⑦如张东荪、刘廷芳、张友渔、成舍我、陈博生、胡政之等,以及德国学者罗文达(Rudolph Lowenthal)、英国《泰晤士报》记者田丕烈(H. J. Timperley)等。见林牧茵:《移植与流变——密苏里大学新闻教育模式在中国(1921—1952)》,第134—135页;黄昭宪:《燕京大学新闻系概况》,引自龙伟、任羽中、王晓安:《民国新闻教育史料选辑》,第39—40页。

术演讲,使学生受益颇多。然而上述教师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他们不管身处国民党体制内或体制外,都不反对国民党秉持的理念和实际的统治。

(四) 人才去向:各有所长的人才培养

燕京新闻教育致力于国际化的中国新闻界领袖人才培养。“在抗战及战后,中央社海外单位……,记者都是燕大出身(多半是新闻系)。代表中央社在1945年春联合国在旧金山开筹备会议的三位记者,是清一色燕大新闻系出来的。”^①司徒雷登回忆道:“有一段时间,中国新闻社派往世界各大国首都的代表几乎全是我系的毕业生,他们在中国报纸编辑人员中的地位也同样突出。”^②同时,该系与密苏里新闻学院有互换学生的合作,而葛鲁甫于1931年在系完成学位论文*Advertising in China*,成为首位获中国新闻学硕士学位的外国研究生。此外,当时国内知名的民营新闻事业也非常欢迎该系毕业生,如《大公报》在1930—1940年代录用的该系毕业生就有20余人,^③其著名记者蒋荫恩、萧乾、杨刚、朱启平等都曾就学于该系。

复旦新闻系的人才培养基本遵照“本土化”的构想。“复旦新闻学系的目的,不外培植一种富有新闻学知识与技能的新闻记者,以备将来发展各地的‘地方报纸’之用。”^④“只要时代来了,地方报的创办的责任,就在新闻学系学生的双肩。”^⑤因此当时该系毕业生大多投身国民党体制外的“地方报”中。1942年后,陈望道主持下的复旦新闻系在政治上倾向于反抗现实统治,争取民主自由,推动社会改革;1943年开始组织的“新闻晚会”实际上是中共复旦地下党组织以复旦新闻学会名义开展的活动;全面内战爆发后,该系学生又站在了上海学生反内战爱国民主运动的前列,成为一支活跃力量。

政校新闻系学生毕业后由学校分配工作,大多去向国民党新闻机构或部门,成为体制内文宣骨干或管理干部。他们在国民党体制内分布范围广、岗位层次高、工作联系紧密;通过长期的实践运作,稳定地织就了一张横跨体制内“政、业、学”三界和“海内、海外”两端的庞大网络,形成了同所谓“密苏里新闻帮”(Missouri Mafia)类似的“政校(政大)新闻帮”,对国民党新闻事业产生深远影响。以《中央日报》为例,在1945—1987年的42年间,担任其社长、副社长、总编辑职务的35人次中就有22人次为该系毕业生。^⑥马星野1952年回忆:“余办政治学校新闻学系十年间,造就新闻人材数在五百左右,其在新闻界已有可称之贡献者,亦不乏人,且此辈青年报人,大体能了解主义,忠党爱国,与燕京大学、复旦大学出身之青年记者,显有不同。”^⑦

三、民国时期大学三类新闻教育办学模式的共同启示

在多维比较民国时期燕京、复旦和政校三所不同类型大学新闻教育办学模式的诸要素后,我们认为其对当今的大学新闻教育有如下启示:

(一) 为中国服务是中国大学新闻教育的立足之本

中国大学新闻教育必须立足中国发展,并为中国新闻事业服务是燕京、复旦和政校新闻教育的共

① 汤德臣:《燕大新闻系杂忆》,引自燕大文史资料编委会:《燕大文史资料(第七辑)》,第107页。

② [美]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北京:北京出版社,1982年,第65页。

③ 林牧茵:《移植与流变——密苏里大学新闻教育模式在中国(1921—1952)》,第150页。

④ 谢六逸:《复旦大学新闻学系概况》,引自龙伟、任羽中、王晓安:《民国新闻教育史料选辑》,第113页。

⑤ 谢六逸:《新闻教育的重要及其实施》,引自龙伟、任羽中、王晓安:《民国新闻教育史料选辑》,第26页。

⑥ 《中央日报》社编:《本报历任重要人事一览表》,载胡有瑞:《六十年来的中央日报》,台北:中央日报社,1988年,第268页。

⑦ 马星野:《自述(1952年4月12日)》(手稿),《马星野档案》099-01-01-01-001。

识。复旦新闻系明确指出要为本国报馆及普通学校培养新闻人才,政校新闻系更是以为“党国”培植宣传干部为己任。即便是充满浓郁“美国味道”的燕京新闻系在办学中也提出协助中国新闻事业发展,使之成为促进公益及国际友好关系砥柱这一“中国化”目标。这启示我们,在任何时代和社会环境中,不管采取怎样的办学模式,根植于本土的中国大学新闻教育必须首先立足中国实际,严肃回答“为谁培养人”这一关键命题;必须以矢志报国的理想和情怀,勇敢肩负起推动中国新闻事业和社会发展,维护国家民族利益的历史使命。

(二) 培养高质量有特色专业人才是大学新闻教育的生存之道

“观察一种教育的结果,最好看它的出产品。”^①民国时期,燕京、复旦和政校新闻系毕业生大多具有扎实的专业理论功底和不错的实际动手能力,能够满足社会对高素质专业新闻人才的共性需求。而不同的是,燕京走的是“国际化”特色路线,无论在何时何地何种环境中,他们总是“执国际二字之牛耳”^②;复旦走的是“本土化”特色路线,扎实的专业功底和敏锐的社会感知使他们总是时代的“弄潮儿”;政校走的是“体制化”特色路线,他们大多将自己与国民党兴衰联系在一起。因此,三校新闻系的人才培养成果不仅满足了社会对于专业新闻人才的共性需求,也满足了社会的差异化需求,赢得了社会的认可和美誉。燕京、复旦和政校之所以能够在民国时期数十家大学新闻教育中脱颖而出,正是抓住了“高质量”和“有特色”这个关键,分别形成了“国际化”、“本土化”和“体制化”的特色品牌。

(三) 开放办学和与时俱进是大学新闻教育的发展之源

身处动荡与整合大时代中的燕京、复旦与政校新闻系都无一例外地受到了艰难办学环境、有限办学资源和复杂社会思潮的冲击与制约,但这种困境从另一方面又给了他们能够进行多种选择的可能和机遇。当困难与机遇并存之时,三校新闻系不约而同取“折中协调”之方针,尽可能地平衡处理自身办学理想与办学现实之间的矛盾,通过开放办学,争取更好的办学资源和条件,争取校内师生与社会各界的理解与认同;通过不断调整优化自身办学实践,在最大程度上满足特定时代和社会现实的不同要求,实现自身发展。这种开放办学和与时俱进的理念和做法,对身处动荡时代与社会环境之中,仍然坚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高水准、高素质专业新闻人才的中国大学新闻教育而言,尤为重要。

(四) 理论与实践并重是大学新闻教育的办学之路

及时而全面的专业实习是促使新闻专业学生尽快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动手能力的有效途径。燕京、复旦和政校新闻系对此都有深刻的理解,并根据自身办学实际充分发挥优势和特长,开展了各具特色的“做中学”实践。三校除建有相似的实践课程和实习平台外,燕京强调学生必须在报业或其他新闻事业机构实习一年方能获得新闻职业证书;复旦强调四年级课程以深入社会,实习考察为重;政校则利用“体制内”便利条件,使学生在实习中既能接触到社会新闻实务,也有机会参与到政府新闻管理工作中。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做法,三校在较短时间内培养出了一批理论水平较高、专业素养较好,具有一定实际操作经验,能够快速上手的专业新闻人才,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中国专业新闻人才匮乏、新闻事业发展落后的问题,还为此后中国大学新闻教育的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

^①刘豁轩:《报学论丛》,天津:益世报社,1946年,第115页。

^②1979年邓小平访美代表团成员中有燕京毕业生7人,占全国人数的三分之一。见林牧茵:《移植与流变——密苏里大学新闻教育模式在中国(1921—1952)》,第150页。

（五）从实际出发“量身定制”高水平师资队伍是大学新闻教育的保障之力

建设高水平的师资队伍是大学新闻教育能够保持高水准、高质量的关键。但在如何建设高水平师资队伍这个问题上,燕京、复旦和政校三校新闻系则是实事求是、量身打造,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燕京的“美国味道”为其创造了延揽国外尤其是美国高端师资的便利,使其得以“量身打造”几乎完全西化的师资队伍;复旦的“本土味道”使其可以也只能选择当时在身份和思想上相对自由的国内新闻业、学两界名人作为师资队伍主体;政校的“体制味道”则是“双刃剑”:既使其有充足行政资源延揽中外各界名人,同时又只能在“不反对”国民党的单一方向选择教师。然而无论是哪种“味道”,都是各校为自己“量身定制的味道”,都是最适合他们各自办学实际的“味道”;而这种“量身定制”使他们的高水平师资队伍建设既能确保“方向”,也能易于“落地”,从而真正发挥“为我所用”的实际效果。

结语

密苏里新闻教育模式对民国时期中国大学新闻教育影响深远。通过“模仿”,近代中国大学新闻教育得以在较高的起点上快速发展。然而,中国大学新闻教育要完成自己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与现实任务,仅仅依靠“模仿”是不够的,还必须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地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创造”之路。“每一个模仿行为都在创造条件,使新的模仿行为成为可能,使之越来越自由与合理,同时又使之具有更加精确的性质。”^①以燕京、复旦和政校新闻教育为代表的近代中国大学新闻教育在“创造”的道路上,将他们对专业主义新闻教育核心理念和办学实践的不同理解与自身所处的时代社会的现实需求以及教育者个人的教育理想相融合,不断进行“被动性与同一性”、“主动性与多样性”的平衡与调适,以立足中国、服务中国为本,秉持开放和与时俱进的态度,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通过“量体裁衣”的发展,逐步形成自身特有的办学模式,以高质量有特色的教育成果打造属于自己的响亮品牌。

(责任编辑:高峰)

A Comparative Study on Higher Journalism Education in Republic of China: Focusing on Journalism Departments of Yenching, Fudan and Central Political School in 1930s and 1940s

WANG Ji-xian

Abstract: In the 1930s and 1940s, the Chinese higher journalism education, represented by Yenching University, Fudan University and Central Political School, created a variety of successful education patterns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own reality and the needs of the time, society and state. These patterns were established on the basis of imitating those of the Western universities, especially the pattern of the Missouri State University. Taking as examples the education patterns of these three intui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at period, this paper is intended to explore what we can learn from the then different ways of doing journalism education through comparing their education purposes, objectives, curricula, faculty selections, and achievements.

Key words: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university journalism education; education pattern; comparative study

^① [法]加布里埃尔·塔尔德、[美]特里·N·克拉克:《传播与社会影响》,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1页。